

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丛书主编 邵培仁——

*Margin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ymbols and Communi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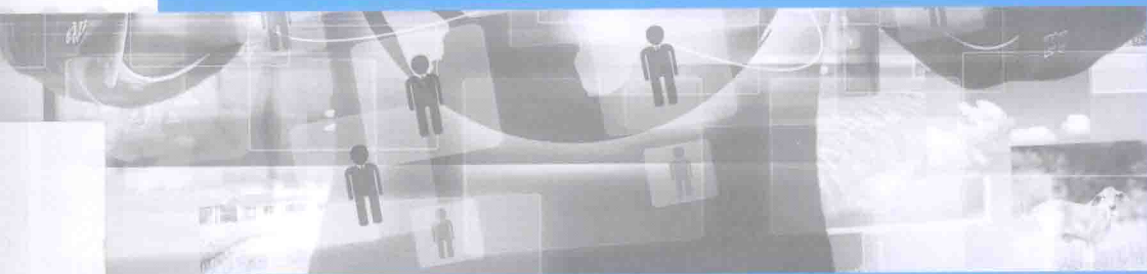
—Based on Social Survey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袁靖华 —— 著

新生代农民工正值青春年华，社会心理融入问题愈加紧迫而棘手。借由符号传播研究、媒介正义研究与人际交往情绪心理研究等，揭开了潜藏在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诸多符号障碍，以推动这一青年群体对城市的身份认同感、心理归属感与关系亲近感。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0YJC860058）成果

浙江省重点研究基地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出版资助成果

浙江省重点一级学科“戏剧与影视学”出版资助成果

*Marginal Identity Integration:
Symbols and Communication*

— Based on Social Survey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袁靖华 ——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 袁靖华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1

ISBN 978-7-308-14188-8

I. ①边… II. ①袁… III. ①民工—社会调查—中国
IV. ①D66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95892 号

边缘身份融入:符号与传播

——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调查

袁靖华 著

策划编辑 徐 婵

责任编辑 杨 茜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云广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301 千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4188-8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全新的时代需要全新的视维

——“21 世纪媒介理论丛书”序言

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与本土化相互勾连、交融的时代,是一个基础研究与交叉研究相互依存、互补的时代;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是一个全球连结、全民传播的新媒体传播时代,是一个高度自发、自主和自恋的人本主义时代。信息传播已走向不分日夜、无远弗届、时时更新、自由分享、透明开放、多元展现的“去专业化”的时代,它不只全面地影响了人类的工作、生活和娱乐,也普遍提升了每个人优化和创新的潜能,更让人们对于生命的尊严、生活的质量和人生的规划有了更丰富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似乎也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困惑与选择之中”,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

那么,在这一特殊的全新的时代,中国媒介与传播研究最明智的选择是什么呢?我认为,最明智选择就是——

第一,要以历史为经,以现实为纬。当一门学科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时,最重要的莫过于先静下心来,反思和回顾已经走过的路。但是,我们回顾和总结媒介研究的历史,并不是要沉溺于它、迁怒于它,而是要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教训、累积经验,为当下的媒介理论和媒介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我们研究历史,要联系现实,而研究现实,也不要割断历史,继往开来,承前启后,才能使媒介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根基。

第二,要以媒介为经,以社会为纬。新闻是社会的镜子,媒介是社会的大脑。研究媒介需要联系社会,研究社会需要指向媒介。媒介是这一学术研究的起点和终点。因此,研究媒介理论,需要以锐利的学科眼光加以审视和分析,也要用社会的尺度来丈量和称衡;要强调媒介理论思维与话语的主导性,也要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延伸和扩展。以媒介为经,可以确保其学术价值和理论意

义;以社会为纬,可以落实其社会价值和实践意义。通过媒介研究,推动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

第三,要以规律为经,以意义为纬。规律所在,科学所托。积极探索和揭示媒介规律,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基本宗旨和首要使命。但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媒介理论研究不应该止步于探索和揭示媒介活动中内在矛盾诸方面的联系和斗争的客观法则和必然趋势,还应该突现和彰显这一过程的价值和意义,进而说服人们自觉遵循媒介规律,主动按媒介规律办事,从而进一步支配、制约和优化媒介活动的姿态、现状与趋势。规律、意义和行动共同构成了学术研究的金三角。

第四,要以中国为经,以世界为纬。中国是媒介理论研究的坐标点,而世界则是它的参照系。如果媒介理论研究不同中国特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结合,不在中国五千年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生长出来,不能指导具体的媒介活动,而只是简单地贩卖、照搬和空谈西方媒介理论,那必然会遭到人们的拒绝,甚至反对。但是,要推进媒介理论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同国际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则必须严格遵守学术规范和游戏规则,在坚持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基础上,使其具有世界元素和全球视野。

正是出于这种思考与选择,我们组织撰写和出版了这套《21世纪媒介理论丛书》。

除此之外,丛书中的每一种著作,还都坚持以理论与现实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导向,选准研究的切入口,运用国际学术界最先进的理论与方法,最前沿的思想与观念,着力思考问题产生的原因、路径和影响,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解决问题,努力将问题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开掘。同时,丛书作者尽力不受媒介理论研究中传统范式和旧有成果的束缚,面向现实,立足交叉,追踪前沿,聚焦集成,努力把内面和外面两个学术世界的优点和精华收归己用,并积极探索适合课题对象和内容研究模式、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

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出站或毕业的博士后、博士生,他们有的已是教授、副教授,有的在学术界有一定的知名度。在浙大访学和读研期间,他们利用学校丰富的馆藏资料,阅读了大量的国内外一流的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媒介学等方面的专著、教材和论文,掌握了一整套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技巧,在通过博士论文答辩的基础上,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课题并获得立项,经过进一步深入研究和体系化,最终形成了已达预期目标的科研成果和学术专著。因此,这些成果和专著不仅符合上述要求,而且具有紧追前沿、观点新颖、内容创新、分析深刻、表述精当等特点,具有相当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但是,我们深知,当代学术研究,犹如学术探险。我们本不该有什么奢望。如果这套丛书能为媒介理论研究和媒介运营实践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为中国媒介和谐与社会和谐的建设稍尽绵薄之力,又能引起媒介学界和业界人士的一些关注和批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莫大的荣幸和鼓励了。

邵培仁

2014年6月6日

于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1)
一、问题的提出	(1)
二、研究视角的选择	(6)
三、研究的基本框架	(18)
第一章 身份认同研究:身份符号	(22)
一、个体身份认同	(23)
二、群体身份认同	(25)
三、符号与身份	(33)
第二章 媒介传播与弱势群体:融合·公正	(43)
一、不公平的焦虑	(43)
二、传播与社会融合	(50)
三、传播与弱势群体	(56)
四、传播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	(71)
第三章 新生代农民工调查:不公的危机	(79)
一、样本的选择	(79)
二、研究方法及其代表性	(85)
三、工作权益的不公正	(95)
四、潜伏的情感心理危机	(111)

第四章 人际传播:关系距离	(120)
一、社会距离:人际交往的意愿	(122)
二、社会关系网络:人际交往的广度	(127)
三、人际传播:人际交往的本质	(131)
四、交往品质:人际关系圈的性质	(138)
五、关系障碍:人际关系的融入程度	(149)
六、语言与空间:日常交往中的符号障碍	(161)
第五章 网络传播:表达素养	(168)
一、媒介接触与消费——表征现代性的符号	(169)
二、新旧媒体认知:评价与依赖	(172)
三、网络媒介使用:信息的中下阶层	(177)
四、媒介素养障碍:传播的主动性与主体性	(181)
五、网聊:作为社交情感工具的网络	(190)
第六章 大众传播:符号资本	(198)
一、大众传媒的符号生产	(198)
二、符号资本理论	(200)
三、符号资本障碍:传媒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符号表达	(202)
四、符号救济:传媒的公正叙事与话语支持	(212)
第七章 身份融入:认同的障碍	(220)
一、融入—认同的测量维度	(220)
二、“我是谁”的迷失	(225)
三、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229)
四、多方合力推动身份融入	(238)
参考文献	(243)
索引	(265)
后记	(267)

绪 论

接触那些我们社会中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匮乏资源的人们,并为之鼓与呼,……显示传播学研究对社会正义的敏感性。^①

——美国传播学者劳伦斯·弗雷(Lawrence R. Frey)

一、问题的提出

2013年的夏天,因为一次意外摔伤,我住进了医院。由于床位紧张,我被临时安置在男病区。病房里有5位病友,其中有2位是外地来杭州打工的农民工兄弟,1位是杭州本地的离退休老干部,1位是外地在杭经商的生意人,还有1位是外地在杭州打工的护工阿姨。这次住院使我被迫短暂地脱离书斋生活,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调查访问工作,如此近距离而又独特地与农民工“生活”在一起。这也是我在此前社会调查时不曾预料到的一次深入体察。

来自贵州毕节的小管,30岁出头,属于新生代农民工^②,之前一直在广州、深圳打工。这次是他第一次来杭州工作,在钱江新城的一家不锈钢材料加工厂工作。工作了将近半年的小管不幸被机器砸伤了右手的四个手指和整个手掌。我刚进医院的时候,就看到他一直在埋首看书。开始我还以为是本什么故事书,没料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小管说,受伤后,工厂老板给他垫付了医疗费用于手术治疗,算是工伤,因为厂里都是给他们买了意外工伤事故保险的。但他很担心之后的康复护理,还有以后干活时手指功能恢复等问题,所以

^① Frey, L. R. et al. Looking for Justice in All the Wrong Places: On a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Social Justice. *Communication Studies*, 1996, 47(1/2), pp. 110-127.

^② 关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概念的界定,研究界与国家相关统计部门基本达成共识,特指1980年后出生的、农村户籍的外来打工者,关于该群体的属性界定,后有详细论述。

特地买了这本书,想从里面找到具体的法律条文依据,看看能跟老板要到多少赔偿金和生活补助金。^①小管对医疗费支付、伤病补偿等经济利益的关切,反映了转移到城市的劳动者居留城市首先要面临的社会保障问题。

还有一位病友,是在建筑工地上工作的老谭,他在工地上被钢管砸伤了右腿膝盖骨。老谭来自重庆忠县,在杭州打工20年了,算是典型的老一代农民工。老谭的妻子在木料厂干活,一个月赚4000多元钱,现在辞工在医院照顾老谭。儿子小谭才17岁,在杭州金沙的一家印刷厂工作,一个月赚2000~3000元,开销很大,每月吃饭、交际、抽烟至少要600元。小谭一家都在杭州生活,每月基本开销2000~3000元,房租每月800多元。老谭还有个小女儿在上幼儿园大班,一个学期3000多元学杂费。女儿暑假后就要上小学一年级了。但因为缺少养老保险证明,无法在杭州入学。老家还有父母在乡下种点地。每年全家回家过年,路费2000多元,总花销万把块。

老谭有建筑公司给他购买的工伤保险,另外他还给自己买了一份中国人寿的意外险。他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已有10多年,一个月可以赚万把块,有点积蓄。老谭一般每天在工地上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四五点天不亮就出门,晚上天黑了才回家。我问他:“你每个月工资收入一两万,那是高工资啊,比一般城里的工薪阶层都要高出一两倍哦。”他说:“那是啊,现在就是大学毕业的也没多少人能够赚一两万一个月的!”我试着进一步探问:“你跟他们比,觉得怎么样?”老谭的回答干脆利落:“工资高算不了什么。我工资再高也还是个农民工啊!起早贪黑赚的辛苦钱,不要说大学生、城里人,哪怕就是年轻一代,农村来的那些小年轻儿啊,像小管,还有像我儿子那样的,呵呵,都还不要干这个呢!

① 2004年我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2004]18号文件)和2006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工伤保险的通知》(浙政发[2006]44号)均强调“各类用人单位招用的农民工均有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凡是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他们办理参加工伤保险的手续”。据笔者在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访问,近年来浙江省对农民工工伤保险的全面覆盖正逐步到位,各市区县全面推进各类企业参加工伤保险,并取消了原先的一些政策限制,如农民工工伤保险不再捆绑养老保险参保,农民工可以在不参加养老保险的情况下单独参加工伤保险等。结合笔者对农民工的访谈调查,只要在工厂里工作的,企业基本上都会给他们购买“意外工伤保险”,这也是浙江省劳动保障部门硬性规定的,目的就是希望通过这一保险来规避农民工群体因工作负伤后可能出现的各类经济困难以及劳资之间的民事纠纷,政府相关部门也将此作为切实保障农民工权益的实事之一加以积极推进。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于2013年5月28日发布的《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2年,全国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7179万人,占外出务工农民总人数的44%,参保比例尚待提高。

又脏、又累、又危险，你说是吧？这也就是我这样的人来干的。你看我的手，这个样子的手，能跟他们那样细皮嫩肉的比？”老谭爽朗地笑着，粗声大嗓地自嘲着。

老谭的话，也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在此前完成了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调查。有一部分问卷来自建筑工地的调查，统计发现：建筑工人的工资水平要远远高于做其他工作的农民工，但是这部分群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却往往更趋向于“我是农村人”。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水平高低与农民工对自我的身份认同（自认为是农村人还是城里人），没有显著相关关系。^① 此前亦有调查发现：月收入不是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②，客观经济地位并不影响其身份意识^③。这次再与老谭的对话相互印证，更令我迫切地想解决之前一直在思考的一些问题：除了宏观制度层面，在微观的个体生活层面，究竟是什么影响了这一群体自我的身份认同？个体社会身份的建构、传播与心理归属具体是如何表现并实现的？

一般来说，身份泛指人的出身、地位、资格，是人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地位，是社会成员的社会属性标识和社会分工标识。^④ 布迪厄指出，身份也是一种符号表征，是符号资本的一种表现形式，符号资本“涉及对声望、名声、奉献或者荣誉的积累”^⑤，即身份承载了社会对个体的声望或荣誉的承认与认可。对于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来说，经济状况或者说工资收入，很多时候虽是他们衡量自我成功的重要指标，但它并不是提高个体社会声望的直接决定因素，也并不当然地意味着个体所属社会地位与社会身份的变化。高工资并不必然代表高社会地位。

当然有必要考察：在何种阈值内，工资与社会身份变化相关？在何种阈值外两者不必然相关？有研究发现，收入的一定阈值与新生代农民工对成为市民的身份诉求有密切关联。当收入水平低于阈值（即当地市民的平均月工资收入）时，新生代农民工在该阶段追寻着收入的最大化，即获取较高工资是其主要

① 具体参见本书第七章“身份融入：认同的障碍”中的“三、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② 彭远春：《论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其影响因素——对武汉市杨园社区餐饮服务员的调查分析》，《人口研究》2007年第2期，第81—90页。

③ 王毅杰、高燕：《社会经济地位、社会支持与流动农民身份意识》，《市场与人口分析》2004年第2期，第1—5页。

④ 赵晖琴：《融入与区隔：东北新移民的身份建构逻辑与群体性差异的表征——基于巴黎的实证调查》，《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6期，第1—21页。

⑤ Bourdieu, P.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Translated by Lauretta C. Clough.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 7.

诉求点。而当收入水平高于阈值时,即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达到了一定程度后,他们在该阶段追寻着效用的最大化,此时,获得等同于市民的身份是其主要诉求点,而单纯工资收入对其成为市民的需求没有了显著影响。^①我们这次在浙江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则发现,在抽样获得的1003个有效样本中,有超过60%的新生代农民工每月收入低于全省平均工资。无论是对全部样本的回归分析还是对达到且超过省平均工资的样本进行的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都发现收入水平高低与他们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没有显著相关性。^②这说明,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自我身份认同的因素远比单纯的收入判断要复杂得多。

首先必须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升与逐渐上涨是推动他们融入城市最为基本的物质前提和经济基础。近年来,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发达省份不断遭遇“民工荒”,以新生代农民工为主体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学研究者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进行分析后提出:2004年以后频频出现的“民工荒”,正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拐点,即开始进入“刘易斯拐点”(Lewis Turning Point)期,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这必然会推动劳动者工资上涨。^③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12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26959元(月收入约2247元),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8752元(月收入2396元);而外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为2290元,比上年提高241元,增长了11.8%。^④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第三季度,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月收入为2542元。^⑤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调查则显示,2013年4月就业流动人口的平均工资收入为3287.8元,同比增长4.9%。^⑥尽管统计方法不一,

① 周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程度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2011年沈阳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78—92页。

② 具体参见本书第七章“身份融入:认同的障碍”中“三、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③ 巴曙松:《中国经济已悄然越过刘易斯拐点》,《经济参考报》2011年5月5日第1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等论文中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下劳动力由过剩转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5月28日发布。

⑤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官网,见 <http://data.stats.gov.cn/workspace/index?m=hgjd>。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中国人口出版社2013年版,第1—14页。

具体数值有些差异,但都能说明一点:在人均月收入层面,农民工与城市市民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

笔者通过调查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取向发现,在对工资收入高低的追求之外,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有着对社会声望等的追求。比如,在寻找工作时,他们不仅仅关心工资高低,比起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关心工资之外的附加值:这份工作是不是比较体面、劳动时间长度与劳动强度怎么样、有没有休闲时间、能不能获得劳动技能、有没有职业发展空间,等等。全国总工会的调查发现:“寻找对‘个人发展更有利’的新工作的人数在新生代农民工中的比例为 12.4%,高出传统农民工相应比例 7.7 个百分点。”^①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3》也称:“新生代流动人口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其进入城市不仅仅是为了挣钱,对未来发展有更多新期待”,“在有意愿落户城市的新生代流动人口中超过七成希望落户大城市”。^②对此,我们的理解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具有比较强烈的摆脱“低声誉”社会地位或者说“污名”社会身份的渴望。换言之,他们有比较突出的自尊需求(*esteem needs*)。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个体心理需求层次理论中,自尊属较高层次需求,包括了对成就、名声、地位和晋升机会等的欲望。^③社会心理学关于自尊的研究亦已普遍证明,人的自尊需求对其社会身份认同的形成与建构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④

根据上述理论与最新统计数据,我们有必要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样一个越来越逼近的现实:随着整个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提升与劳动力价格的逐渐上涨,新生代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正在逐步逼近并达到城市市民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伴随着这一经济目标的逐步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对融入城市、获取“城里人”的社会身份地位及相应的社会声望等方面的自尊需求就会变得越来

① 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2010 年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状况调查及对策建议》,是该课题组于 2010 年 5—6 月重点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开展专题调研的报告结果,该次调查在全国 25 个城市(区)1000 家已建工会企业中进行了问卷调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编:《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2013》,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14 页。

③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等:《别忘了,我们都是人:马斯洛论管理》,李斯译,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2—14 页。

④ Michael A. Hogg et al. *The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erspective: Intergroup Relations, Self-conception and Small Groups*. In: Ronald J. Fisher (e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Resolu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1990, pp. 246-276.

越突出和迫切。因此,研究和讨论如何缩小这一群体与城市市民的身份差距——用布迪厄的概念则是“符号资本”的差距——获得被认可的成为“城里人”的社会身份及相应的社会声望,推动他们顺利“融入城市”,是当前发展和谐社会、推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当务之急。

本书从传播研究出发,视传播为构造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石,“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手段”^①,集中关注大众传媒、人际传播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表达等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与建构过程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在传播层面有哪些因素影响了该群体的身份认同?什么样的传播途径更有助于重建身份?日常生活中微观层面的人际交流、信息传播乃至情感沟通如何影响不同身份群体之间的和谐关系?各类媒介的传播活动在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媒介在助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获取城市身份认同方面有何作为?

二、研究视角的选择

(一)从社会融入的概念界定出发,找到传播学研究的着眼点

1. 国外关于移民社会融入的研究

“在经典社会科学研究中,社会融入是解读社会和谐和社会冲突的核心概念”^②,是消减社会排斥与社会隔离、推动社会关系和谐的主要途径,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习俗、传统、观念、心理、认知等社会生活的多个侧面体现着外来移民与迁居地的关系。目前对社会融入(social integration,也译为社会融合、社会整合)尚无统一的定义,对什么是融入、如何融入、从什么视角衡量融入,不同研究者从不同的学科背景出发,有着不尽相同的理解。任远等归纳了国内外关于社会融入(在其文中译为社会融合)的20余种定义后指出:“不同学者研究社会融入的角度不同,有些定义认为社会融合是双向的概念,即融入者和被融入者通过相互作用达到融入的过程,而另一些则强调融入者主动适应被融入环境的过程;不同学者研究社会融入的内容不同,有些定义强调文化和情感的融入,有些则强调经济和社会的融入;有些强调融入的过程,有些强调社会融入既是

^① [美] W. 施拉姆、W. E. 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②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第1—24页。

过程又是结果。”^①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新生的劳动力及其转移是一种全球普遍现象,欧美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同样遭遇了外来新生劳动力的在地化融入问题,其中社会学、政治学、人口学、人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对移民的社会融入研究着力最多。

梁波、王海英(2010),毛哲山(2011),张传慧(2013),张文宏、周思伽(2013)等将国外在该领域的研究归结为从同化到适应再到融合的发展过程;李培林、田丰(2012),悦中山、李树苗等(2011)将之归纳为从直线型融入到曲线型融入到区隔型、多元文化融合的发展过程。简言之,有关移民融入的基本概念变迁是从早期的“同化”(assimilation)发展为后来的“适应”(adaptation)、“融合”、“包容”等。早期的“同化论”一度是欧美移民研究的主流。最早关注芝加哥城市不同族裔移民生活状况的帕克等人就认为,不同族群移民之间的融合必然要经历竞争、冲突、适应、同化四个阶段,移民融入迁居地的最终结果就是实现同化。^②随着多元文化观的兴起,“同化论”因其忽视移民的文化多样性与族群差异性,过于强调移民在融入迁居地过程中的被动与单向度,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③人类学研究提出了“适应”的概念,从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分别讨论社会融入问题。客观层面主要指移民在外部特征上适应迁居地的生活,如就业、收入、消费、语言、组织参与、生活习惯等;主观层面主要指移民内心的态度与价值观转变,实现了对当地的心理认同。较之“同化论”,“适应论”更强调移民的社会融入是一个与当地的“社会互动”过程,而非单向度地同质化于当地。^④“融合论”则进一步强调社会融入是一个移民与当地双方之间彼此互动、相互适应的过程,而不再停留于移民一方单向度地适应迁居地。^⑤近年来欧美学界在迁

① 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第11—20页。

② Barbara Ballis Lal. *The Romance of Culture in an Urban Civiliz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p. 29.

③ Barbara Schmitter Heisler. The Future of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Which Models? Which Concep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2, 26(2), pp. 623-645.

④ John Goldlush & Anthony H. Richmond. A Multivariate Model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74, 8(2), pp. 193-225.

⑤ Winfried Ellingsen. Social Integration of Ethnic Groups in Europe. How Can Concepts of Place and Territoriality Help Explain Processes, Policies and Problems of Socially Integrati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a European Context? *Geografi i Bergen*, University of Bergen.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2003, <http://brage.bibsys.no/xmlui/bitstream/handle/11250/162336/1/winfried%20ellingsen255.pdf>.

居地的公共政策研究中更加强调移民社会融入的“包容”(inclusion)^①、“合并”(incorporation),侧重研究迁居地应为推进移民融入当地社会提供哪些社会服务与政策支持。^②如欧盟在解决不同族裔移民问题时,就从“包容”的视角将社会融入界定为:“指通过缩小差距,降低最弱势社区与社会之间的不平等,并确保支持能够传递到最需要的群体。意味着无论在工作、教育还是更广泛的社会层面都积极促进参与机会”^③,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包括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家庭团聚、长期居住、政治参与、入籍、反歧视等共6个领域24个测量维度、142个政策考察指标的“移民融入政策指数”(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在欧美31个国家得到广泛应用。^④

2. 国内关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研究

外来迁移人口在迁居地的社会融入程度代表着其在迁居地的社会关系水平,是判断不同群体间社会关系的主要依据,也是代表一个社会内部关系融洽与和谐程度的主要表征。^⑤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不仅事关数亿农村青年群体的个体生活幸福,更事关转型期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成败,事关城市社会建设的长治久安。“新生代农民工是现代化建设的一支生力军,因其数量庞大和身份独特而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全局和国家未来发展……他们能否顺利融入城镇直接影响着和谐社会建设。”^⑥

自21世纪以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社会融入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

① Ratna Omidvar & Ted Richmond. *Immigrant Settlement and Social Inclusion in Canada*. Perspectives on Social Inclusion Working Paper Series. Laidlaw Foundation, 2003.

② Barbara Schmitter Heisler. The Future of Immigrant Incorporation: Which Models? Which Concep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2, 26(2), pp. 623-645.

③ ESFP(European Structural Funds Program). Further Information: Social Inclusion. 2007—2013 European Structural Funds Program, <http://www.esep.co.uk/03-info-social-inclusion.html>. 转引自刘建娥:《乡—城移民(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实证研究——基于五大城市的调查》,《人口研究》2010年第4期,第62—75页。

④ Thomas Huddleston, Jan Niessen, Eadaoin Ni Chaoimh, Emilie White. Migrant Integration Policy Index III, Brussels: the British Council and Migration Policy Group, February 2011, http://issuu.com/mipex/docs/migrant_integration_policy_index_mipexiii_2011/9?e=2578332/3681189.

⑤ Enrique Gracia & Juan Herrero. Determinants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Community: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Personal, Interpersonal and Situational Variable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4(14), pp. 1-15.

⑥ 韩长赋:《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个重大问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调查与思考》,《光明日报》2012年3月16日,第7版。

研究的重要领域。据笔者于2014年6月16日在中国知网以“新生代/青年农民工”、“新生代/青年民工”、“新生代/青年流动人口”、“新生代/青年外来务工人员”等为篇名/题名检索的结果,共获得5314篇文献信息,其中包括硕士、博士学位论文516篇,标注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的达282篇;介入的学科涵盖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大多数一级学科,如社会学、人口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新闻学与传播学、法学、文化学、文学等。国内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最勤、成果也最多的是社会学。近年来围绕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入问题,主要有四类研究视角:一是以社会排斥与社会距离为视角,强调农民工融入城市存在的心理障碍;二是以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为视角,注重揭示农民工是否具备融入的社会关系资源;三是以人力资本为视角,关注农民工文化教育水平与融入的关系;四是以社会认同为视角,深入农民工文化心理归属与身份认知,探讨融入的标志和衡量标准,其研究重点围绕身份认同、社区归属感等展开。

田凯、朱力等指出,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实际上是再社会化的过程,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包括3个层面: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心理或文化层面。^①而心理或文化层面的融入则集中触及“身份认同”问题。早在2001年,社会学研究者王春光就从城乡社会空间和群体记忆的互动视角,考察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揭示了农村流动人口的代际区分以及上一代和新生代在身份、社区等认同上的差异。他指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较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身份认同等方面更具模糊性,既无法认同城市社会,又减弱了对农村社会的认同,并给出了一个悲观的结论,认为在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下,新一代农民工既无法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社会。^②

概言之,社会学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注意到了他们在融入城市过程中的现实困境,尤其是身份认同的心理危机,强调“社会融入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也是最后一环,即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③,并试图从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层面找到原因。研究者普遍认为: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受教育程度、职业期望值、对物质/精神享受要求较高,被剥夺感、不公平感、居留城市期待感较强。为此,社会学研究一再警示: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适应农村,又无法融入城市,处于社会认同和身份认同双重危机之

① 朱力:《论农民工阶层的城市适应》,《江海学刊》2002年第6期,第82—88页。

② 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第63—76页。

③ 李培林、田丰:《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社会》2012年第5期,第1—24页。